

人文与社会译丛

THE WORLD OF THE POLIS


城邦的世界

秩序与历史 卷二

Eric Voegelin

[美国]埃里克·沃格林 著 陈周旺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城邦的世界

秩序与历史 卷二

Eric Voegelin

[美国]埃里克·沃格林 著 陈周旺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邦的世界: 秩序与历史: 2 / (美) 沃格林 (Voegelin, E.) 著;
陈周旺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6

(人文与社会译丛)

书名原文: The World Of The Polis

ISBN 978-7-5447-2685-6

I. ①城… II. ①沃… ②陈… III. ①政治思想史—古希腊
IV. ①D0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6757 号

Copyright © 2000 by The Cura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Columbia, MO 65201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Cura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through Vantage Copyright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3-160 号

书 名 城邦的世界
著 者 [美国]埃里克·沃格林
译 者 陈周旺
责任编辑 王 蕾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6.5
字 数 386 千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2685-6
定 价 54.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目 录

主编的话	1
编者导言	1
序 言	57
详细目录	59
导论:人与历史	69
第一部分 克里特人、亚该亚人和希腊人	
第一章 希腊与历史	95
第二章 克里特与亚该亚社会	121
第三章 荷马和迈锡尼	136
第二部分 从神话到哲学	
第四章 希腊城邦	183
第五章 赫西俄德	196

第六章	告别神话	238
第七章	美德与城邦	258
第八章	巴门尼德	279
第九章	赫拉克利特	297
第三部分 雅典世纪		
第十章	悲 剧	325
第十一章	智 者	350
第十二章	权力与历史	418
索 引		463
译后记		513

编者导言

本书最初由路易斯安那大学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经过重新排版,编入《埃里克·沃格林文集》,这样一来,页码就有所不同了。不过,除了一些无伤大雅的改动之外,内容原封不动:我把一些不甚熟悉的古人名字,比如 Ovidius, Rhodus,换成了标准的英文名字奥维德(Ovid)和罗得斯(Rhodes)。我自始至终采用相同的名字,比如,克诺索斯(Knosos)或狄奥尼索斯(Dionysos)。我也尽力去校正一些希腊文翻译中出现的语法错误,将一些冷僻的用法纠正过来。此外我没有擅自篡改一本书的文风,对此,作者本人已然透过出版社有所了解。

1. 作家,斗士

沃格林对于语言问题十分敏感,他把遣词造句当作是头脑清晰、思路缜密的标志。^①而且,他用并非母语的一种语言,去吃力地表达学术

^① “破坏性语言”乃是“错误意识”的症状和起因,反对“破坏性语言”的必要性,参见沃格林,《自传反思》,埃利斯·桑多编(1989; availabl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9),第17页。在这里,他承认受到斯蒂芬·乔治的圈子及其“重拾”德语之努力的影响,也承认受到卡尔·克劳斯的影响,后者对语言败坏的分析,是其“文化批判”

问题,可以理解,他对那些傲慢无礼地批评他英语不行的讥诮,是多么忿忿不平。对于中肯的建议他欣然接受,而对来自于美国文人中的佼佼者,比如科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的嘉许,则颇感自得。

然而,即使是抱同情之理解的读者,也发现《秩序与历史》“难以卒读”,“非供炉边闲读之用”。^①余者则抗议沃格林屡屡“运用专业词汇,这些词本来就费解,作者也不好生解释”^②。在一份鞭辟入里的评论中——这篇评论为了解释沃格林的真实目的,也着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杰哈特·尼尔迈耶(Gerhart Niemeyer)提到“沃格林和他的读者之间存在一种独特的——巨大的——沟通困难”^③,这已经超出乱用生词和“日耳曼式”诘屈聱牙文风的范畴。^④尼尔迈耶正确地指出,沃格林

(Kulturkritik)之核心。克劳斯认为相伴而来的社会结构的破坏,为作为其化身的领袖的崛起、群众运动的勃兴和随之而来的暴行推波助澜,这一真知灼见,更清楚地体现在第50页。败坏的语言不宜当作分析工具,它本身就需要加以批判分析——相当于弗朗西斯·培根的“偶像”概念——参见《自传反思》,第93页。人们轻而易举就可以成倍地援引出沃格林对语言变形,对需要建立一个知识机构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心。

① 查尔斯·舒尔在 *Social Science* 34 (1959) 第54页验证了他对沃格林“语言流畅”、“汪洋恣肆”风格的赞美。R. L. Shinn, *Saturday Review* 41 (March 8, 1958), 27.

② R. 安默曼, *Journal of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19 (1958), 第540页。诺曼·波提奥斯,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75 (1960), 第288—89页,写道,“难以卒读”。对此再加油漆醋也不为过。

③ 杰哈特·尼尔迈耶, *Review of Politics* 21 (1959), 第588—97, 594页。

④ 维克托·埃伦伯格,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87 (1959), 第369—73, 373页:“晦涩抽象的词语,让人联想起社会学的术语,比如 civilizational, immanentization, dilemmatic。”C. A. 罗宾逊,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3 (1957—1958), 第939—41页:“这种风格造成了不必要的困难。”约翰·坎贝尔讨论沃格林著作的意义,称“它触及一个问题,即语言作为个体社会中秩序和无序的一种力量,在其深处是模棱两可的”,但又把沃格林刻画为“一个典型的日耳曼学者”,“有着贝多芬和瓦格纳式的热情(sic)和感召力”: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68 (1982), 第80—91, 80, 91页。

的研究方式,在当前的社会科学实践中实属异类,可能他刻意要与当代主流的学术风气作对。如此说来,沃格林就是一个枕戈待旦的思想家,他踌躇满志要建立一套批判性词汇,去对付那些陈词滥调,他要用这套词汇来分析问题,凭学问之力量,去克服他所处时代的危机。可想而知,他批判的对象,对他所传达的信息,自然是心生抗拒。在此意义上,“沃格林与他的读者之间的沟通困难,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秩序问题”^①。这就是沃格林笔下的思想家的“柏拉图处境”:身历无序之经验,去追问真正的秩序。^②在《秩序与历史》第一卷的导言中,他写道:“朝向真理的运动,始于人意识到自己生存于非真理之中。”^③他个人对当时意识形态氛围的反应,就相当于柏拉图与雅典腐败的批判性对立。柏拉图遂成为一切真正哲学努力的典范。但丁·杰米诺(Dante Germino)在他给《秩序与历史》下一卷《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所写的导言中,抓住“柏拉图处境”大谈特谈。^④在此,只须指出柏拉图在沃格林的历史哲学,特别是在他对希腊人之诠释中的关键意义,就已经足矣。

沃格林的目的,不是摘录过去的名言,而是在一个更先进的分殊化水平上,重演柏拉图对雅典危机的反应。重演,意味着被一个典型的教训所

① 尼尔迈耶, *Review of Politics*, 第594页。

② 沃格林好斗之心,和他的切肤之痛(*tua res agitur*),在诸如下面这些段落中表露无遗:“《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对阵卡里克利斯(Callicles)的情势,真令我们当中某些人心驰神往,他们感到自己身处柏拉图之处境,他们发觉,那些我们今天还与之为伍,明天就要默许将我们杀掉的人,不过是些衣冠禽兽。”[《埃里克·沃格林文集》(以下简称《文集》。——译注),第十六卷,《秩序与历史》第三卷,《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但丁·杰米诺编(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0),第91页。] Arthur W. Adkins,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81(1961), 192—93, 指出沃格林“显然身感处于重重困厄之中,渴望反戈一击”。

③ 《秩序与历史》第一卷,《以色列与启示》(1956; availabl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9), 第xiv页。

④ 我很感谢杰米诺教授将他精彩的导言的复印件在出版前就提供给我。

打动,这个教训只能通过当场重演,也就是说,通过重构那些隐藏在词句和符号形式背后的激发性经验,来得到确切的理解,而这些词句和符号形式,已经作为文献证据流传下来了。沃格林将柏拉图的哲学理解为自身努力的一个先声。留存下来的他对希腊资料的亲笔批注——这些希腊资料,是他为计划中的《政治观念史》第一卷所准备的——很能说明问题地划分为两辑,分别标上“柏拉图”和“无柏拉图的希腊人”。^①这是沃格林理解希腊经验的基本结构,它统驭着《秩序与历史》第二卷和第三卷之间的资料划分。而这个基本结构在准备之前更早的计划时,就已经显露出来了。“无柏拉图的希腊人”是本卷的主题,对于沃格林的研究来说十分重要,须知柏拉图,政治科学的奠基人,就是从这一领域中脱颖而出,并与之相对立的。第二卷大致覆盖了希腊一千年的生活和思想;第三卷完全献给柏拉图一个人,还有一个很有价值的,但不过是次要的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尾声。

毫不奇怪,至少会有那么一位有思想的读者,会因之而相信,沃格林“对希腊人不感兴趣,除非他们有助于”他的主旨:历史秩序兴起于秩序历史之中。^②沃格林确实否认这样一种看法,即他应该去应付“每一种现象,仅仅因为它存在”^③。他在本卷中写道:

^① 见《政治观念史》,第一卷,导言,阿塔纳西奥斯·莫拉卡斯编,《文集》,第十九卷(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7)。

^② 斯坦利·罗森一篇重要的《秩序与历史》的书评,载 *Review of Metaphysics* 12 (1958), 第257—76, 258页。罗森更狭义地表达了这一限定,理由不在于从中可以引申出历史秩序,而是无形中为“汤因比通过历史向神进军”推波助澜。这是对《秩序与历史》第二卷和第三卷最高水准且最贴切的争鸣式批评。如果它最终无法还沃格林著作一个公道,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尼尔迈耶所指出的沟通困难,是因为沃格林在这两卷中晦涩的表达方式。欲知详情,且听下文分解。

^③ 《论美国人的心灵形式》, Ruth Hein 译, 尤尔根·戈布哈特和巴里·库珀编并写编者导言(1995; availabl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9), 《文集》, 第一卷, 第4页。

我们必须经得住诱惑,避免将秩序和历史的研究扩展到希腊政治文化的研究——我们的分析一定要限于那些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是他们的发现决定性地促进了对人和社会的秩序的理解。^①

于是,《城邦的世界》所言传的,较之标题所示,既多一些,又少一些。它的覆盖面没有那么大,因为它只是精心挑选了其中一些城邦政治文化的表现。它所蕴涵的东西却更多,原因有二:它囊括了先于希腊城邦出现的文明早期阶段;它还力求将希腊的历史意义整合进一个更宏大的思想的体系之中。尽管本卷仍然流露出它缘起于一部“观念史”,被设计成一本“刨根问底”的教科书,但它绝无凭推衍来重构过去之企图。一些文本显然深深打动了沃格林,但他对古代世界的探讨,却绝无发好古之幽思的痕迹。尽管古典学家每每发现他的分析令人为之一振,但他的著作对古典研究却无持久之影响,其中一个缘由无疑就在这里。^②

在一篇在其他方面都大放厥词和误人子弟的评论中,莫西斯·哈达斯(Moses Haddas)无意中发现,沃格林书中的讲解部分和他称之为劝导部分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重要区别。^③哈达斯写道,文本的引述“流畅易懂,偶尔横生妙趣”。这无疑评论人所认为的“正确而吸引人”的

① 本书,第七章,第4节。

② 雷蒙德·魏尔在 *Revue d'Etudes Grecques* 73(1960),第5466—68页写道,沃格林的著作高于一般的学问,其实已经是高处不胜寒,但是令身为杂志评论人的他感到不爽的是,只有像他自己这样的希腊主义者才会饶有兴味地去读沃格林,而不是那些准希腊主义者。

③ 莫西斯·哈达斯,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1958):第442—44页。关于这一评论中所包含的误解和歪曲,埃利斯·桑多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见 *Social Research* 28(1961):第229—34页。

部分。当然,也就是在这个部分中,研究的思路(order)可以完全转化为推论引述的思路。相反,“劝导”、思和理论的段落,就是“晦涩难懂的”。根据哈达斯,沃格林“存心搞得模棱两可”,运用一种“私密性语汇”来推进一个可怕的政治日程。

其实沃格林的做法没有任何可怕抑或见不得光的地方。如果他的著作中某些部分的语言,碰巧是“私密的”而不够晓畅,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想按照一个先入为主的范畴来划分资料,而是力求从资料本身出发,去引申出解释的原则。沃格林对文献的检验,既把它们当作是人类经验的证据,也当作是特定的人和社会以何种方式来使自己的经验有意义的证据。阐释者仅仅是去谈论“有关”经验的东西,这对经验是不公道的,虽然它是外部世界的一个对象或事件。相反,在一项开放性研究的过程中,就需要开发一种多少有些适当的语言,以想象或者亲历的方式去分享该经验。资料的引述,是一个必要步骤,而不是目的本身。正如沃格林在他的《自传反思》中所回顾的那样:“我总是身陷问题之中,这个问题就是,为了形成理论表述,我不得不引述资料。以此为5 基础而建立的理论表述,不过是一个分析结果而已。”^①

如此一来,尼尔迈耶所说的沟通困难,似乎就升格为沃格林研究的性质和他的受众思维习惯之间的不一致:他所关注的中心,不是推论式命题,这些通过其他推论式命题就完全可以应付了。然而,这是最对他的读者的认识论先见胃口的模式。在一个更基本的层次上,沃格林的研究,阅尽浩如烟海的历史信息,远远超出了众人的知识范围,后者都是跟着知识时髦走的,只不过是知识的懒虫和无知者。

沃格林渴望从他的思起步,使这种沟通困难进一步加剧。他通过铺天盖地的资料来工作,不断重新设定自己的理论立场,那些在他看来

^① 《自传反思》,第81页。这段话接着说道:“公众对产生一定理论见解的资料是不熟悉的,换言之,缺了这些资料,谈何理论见解。”

经不起进一步的真凭实据检验或者仔细推敲的资料,他都毫不犹豫地弃之若敝屣。但他并不总是回头重申他的思想根基,几乎所有他的书——本卷当然不例外——在方法论上都是晦涩难懂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一贯向新的证据和经验保持开放,不会为了自圆其说而牺牲这些新东西。不过,他的晦涩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归咎于他渴望与时俱进。^①按照沃格林著作的取舍原则,他把某些名篇的解读当作是现成的,尽管它们当然也要不断接受新的检验。每当它们出现在他的论述过程之中,他并不觉得有必要从头讲起。沃格林有时候被指教条化,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此。^②

一气呵成的著作给沟通造成了限制。然而,除了偶然产生的限制 6 之外,某些限制也是这项事业固有的特征。现实经验用以言说的词语和符号形式,向讨论和理性分析开放。要想追溯到激发性的经验中去,这种分析确实是唯一可能的出发点。但是,这些经验本身就其性质而言,是超越逻辑推理的。人们无法从某些比这些经验本身更现实的东西中去推导出它们。人们唯有期待一种对这些经验的移情理解,让诠释者的意识浮出水面。意识的真理被人领会的思辨过程,无法干净利落地将研究的思路从论证的思路中分离出来,达到最理想化的推论式

① 正如格里戈·塞巴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一阶段沃格林著作的特点,就是“只能根据1966年以来的沃格林著作和1980年浮出水面的文献证据来理解。《政治学中的新科学》来自于一种青蛙程式:历史分析跳过未明言的理论基础;这样做的时候,理论就跃过分析,跳到要在很后面才浮出水面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上”。“Prelude and Variations on the Theme of Eric Voegelin”, *Eric Voegelin's Thought: A Critical Appraisal*, 埃利斯·桑多编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2), 第3—65, 26页。

② 在这一方面,沃格林也被指责为不够教条,因为他太喜欢顾及现实经验的主观方面了,“在缺乏所需的教条和形而上学基础的条件”下,始终逃不出罗马教会的客观主义本体论的必然性窠臼,诚如托马斯·巴里所言, *Thought* 33 (1958), 第273—78页。

证明。^① 阐释者的意识,只能推断式地划分为认知的主客体,它可是分析的试金石。

我们已经说过,沃格林的很多说法,无可否认都带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这种口吻,正如他的学生所回忆的那样,对他课堂教学的影响,比对他著作的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②有人辩称,一定程度的发作是有必要的,这样才能将他的读者和听众从我们时代的意识形态沉睡状态中唤醒。^③沃格林对“无知者”毫无耐心,指望听课者做的功课跟上“科学潮流”。这无疑是将山羊从羊中区分出来(西谚,明辨好坏之意,中文对应的也许是“大浪淘沙”。——译注)的办法。在某种意义上,随时随地的发作,是知识分子有胆气的证据,而这种胆气是从事哲学所必需的东西。我们热切关心的是达到真理、树立真理,来反对周遭“舆论氛围”的谬误,却面临一名教育者和未来的改革者的悖论:此人根本无意去博取听者的善意。

沃格林的使命是一位学者的使命,他的天职是推进历史和社会中人的科学。^④这一学问自说自话,或者说不屑于自辩。约翰·A.坎贝尔总结道:“除了极少数心有灵犀的读者之外,我想沃格林并不太在乎他的读者的想法。凭我的感觉,他把自己的著作当作是一系列的苦思冥想,它那近乎完美、本身又模棱两可的真理,有的读者会看到,有的读者

①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Anamnesis*, 3—13.

② 他的发言铿锵有力、旁征博引,让人心潮澎湃,但是他对前来问学的学生,会毫不犹豫地咆哮“lesen Sie halt was!”——大意是:“为什么你不以变化的眼光读书!”

③ 关于赫拉克利特的“沉睡者”,每个人都做着自己的梦,而不是醒来面对共同的现实,参见本卷第三部分的导论。沃格林将这个概念用在古代智者和现代知识分子身上: *Anamnesis*, 尼尔迈耶译(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0), 第80, 98页。

④ 参见尤尔根·戈布哈特的文稿,“The Vocation of a Scholar”, to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Eric Voegelin*, Stephen A. McNight 和 Geoffrey L. Price 编(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7), 第10—34页。此文对沃格林的学术成就的缘起和发展,做了精彩的评价。

则看不到。”^①更确切地说,尽管沃格林渴望树立真理,让它广为人知,为之摇旗呐喊,但是,向读者摇尾乞怜,却非沃格林所欲。^②

沃格林的书,最好是读成思辨小品。实质性的沟通,意味着克服意识形态语言的障碍,这在他看来,既无关乎信息之传递,也无关乎信仰之传播,而关乎对思辨过程的参与,这种参与揭示和建立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让作者和读者达成默契。^③但是,参加沃格林研究的邀请充满了挑衅语气:

从诞生之日起,政治的科学就是一场战事(militant enterprise),

① 坎贝尔,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第91页。

② 沃格林的论辩风格,某种意义上归咎于他所处的环境。他说,他“学会了讨论和争辩”。除了学问精深的 *Geistkreis* 对他的知识形成产生鲜明影响之外,他还卷入了与他在维也纳成人教育学院(Volkshochschule)成人教育班激进学生的“思想混战”之中。在这些争论之中,他写道,他“不能让步,否则(他)将丧失权威”。这个语境和意识形态气氛显然诱使他对抗而不是参与到他的对话者之中。他讲了他班上一位和善的年轻人的故事,这个年轻人与他推心置腹,“当我们有了权力,我就不得不杀死你”。如果这证明了意识形态是一种无视道德与知识的权力,那么,它也表明对抗作为一种有效劝说手段的局限性。《自传反思》,第86页。

③ “思辨也是他所谓实质沟通的基础,这种沟通有别于实用的和蛊惑人心的沟通。如此说来,除非我们是在进行‘精神操练’,否则就不是真的在阅读沃格林。”弗里德里克·劳伦斯,“The Problem of Eric Voegelin, Mystic, Philosopher, and Scientist”,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Eric Voegelin*, McNight 和 Price 编,第35—58, 50页。与同一本书中戈布哈特在“The Vocation of a Scholar”一文所表达的观点针锋相对,第10—34页,我认为劳伦斯的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一味看到其中对立的一面,而没有留意到其中牵线搭桥的思辨以及韦伯的智识诚实,这就降低了戈布哈特与沃格林之间的默契程度——甚至是与韦伯。只有当一个人处于理性状态,才能从根本上区分对现实的思辨式领会和智识诚实,当然这里说的,不是古典意义上的广义理性,而是严格意义上的、基督教的“纯”自然理性。

8 是捍卫实践和政治真理之战。它捍卫人在社会中存在的真实知识,将知识分子施舍的虚假意见拒之门外;它捍卫人的真实存在,不让人受到知识分子的腐蚀。^①

2. 意识的哲学

刚才这段引文,与《政治的新科学》和《秩序与历史》前三卷产生于同一时期。正是这几本书令沃格林蜚声国际。它们固然是长期酝酿之作,尽管在诸多方面都不免要被沃格林更成熟的著作所超越,但是它们并不仅仅代表他思想的一个过渡阶段。沃格林赖以成名的思想,就处在这个阶段。

沃格林自己常常谈起一次决定性的方法论转折,迫使他放弃了宏大的《政治观念史》(直到今天才在《文集》中出版),开始了他“自己的《秩序与历史》工作”^②。一部受人所托的教科书,篇幅有限而且设计老套,这相对于沃格林的研究,实在是捉襟见肘。他为《政治观念史》准备了大量资料,爬梳良久之后,感到茅塞顿开,对哲学史本来目标和方法的感觉大增:

我不得不放弃把“观念”当作历史目标的念头,而把对现实的经验——个人的、社会的、历史的、宇宙的——确立为历史性探索的现实……确认主题,然后根据主题来确认探索该主题的方法,这

^① 沃格林,“Necessary Moral Bases for Communication in a Democracy”, *Problems of Communication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 R. C. Seitz 等编(Milwaukee: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1956), 第53—68, 53页。我强调此处。试比较两种坏脾气,一种源于对20世纪意识形态的苦涩经验,一种是上面相关注释中对“柏拉图处境”所说的。

^② 《自传反思》,第80页。我强调此处。《政治观念史》的一波三折,放弃它的偶然和必然原因,参见第一卷导论,《文集》,第十九卷。